

關稅霸凌不得人心 對接內需多邊謀新局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向全球 185 個國家及地區加徵 10%至 50%不等的「對等關稅」。此關稅名為「對等」，實為霸凌，不僅破壞世界貿易體制，製造更大的不公平，更可能加劇美國通脹，導致美國乃至全球經濟衰退風險，損人不利己，受到國際社會強烈反對和批評。面對外圍環境不確定性，香港要從兩方面做好應對準備：一是積極對接國家大市場優勢的強大內需，加強產品內銷；二是發揮香港對外友好交往條件，繼續推進「中國+N」策略，尋找替代生產基地，爭取與其他經濟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以資金和市場拓展支持港商調整經營模式和策略。

盧金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美東時間4月2日，特朗普宣布對美國所有貿易夥伴徵收10%的「最低基準關稅稅率」，涵蓋全球185個國家和地區，還對約60個被美國視為設有不公平貿易障礙的國家和地區，加徵額外關稅，當中對中國進口貨品加徵34%關稅。中國外交部對此回應表示，美方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嚴重損害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正當利益。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美國聲稱為減少轉運和逃稅風險，對香港產品加徵所謂「對等關稅」，脫離事實，充分凸顯其為打壓對手的霸凌行爲。全球眾多國家指責美國的決定，多國表明將作出反制措施。

「對等關稅」或掀全球風險

特朗普將推出「對等關稅」之日定為所謂「解放日」，但全球眾多收入偏低，甚至深陷戰火的貧窮國家，卻遭徵收稅率極高的關稅。特朗普宣稱「地圖上都找不到」的非洲內陸國家萊索托，竟也面臨高達50%稅率。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指控的關稅稅率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是將「美國與各國的貿易逆差」除以「美國進口貿易額」得出；當中，美國2023年服貿順差高達2,780億美元，特朗普政府或「出術」誇大他國關稅，以便在談判中施壓。

經濟學家警告，關稅戰會加劇全球經濟衰退風險，並將傷害美國自身行爲和消費者，美民眾勢必面臨通脹加劇情況。彭博社便指出，美國會成為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最大輸家。事實上，美國以關稅作為談判籌碼，對185個國家和地區加徵關稅的做法並不可能長期持續，對美國資產市場造

成的損害反而更大，從美國股市大幅下跌可見，高關稅可能會誘發美國通脹升溫，削弱消費者購買力，令整體需求下降。

特朗普「對等關稅」的幅度遠超預期。按特朗普說法，徵收邏輯為非美國國家對美貿易壁壘（折算成關稅稅率）的50%，且最小值為10%。關稅戰不僅單單影響各國和不同地區的出口及供應鏈布局，更重要的是，還會對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性造成衝擊，損害國際貿易秩序，其他經濟體可能採取反制措施，或將引發新一輪全球貿易戰，影響深遠。這場以「解放」為名的貿易豪賭，終將讓美國成為全球化孤島。

在風險中發展多邊合作機遇

必須留意的是，目前美國關稅政策如何實施、能否真正落地仍存在諸多變數，其國內業界和民衆的反彈以及世界各國政府的博弈反應和反制措施亦極不明朗，短期內國際貿易秩序將陷於混亂。預計不論是出口至美國的企業，還是美國進口商，多會持觀望態度，可能暫停或延後下單，短期內或會對貿易活動造成「休克式」負面影響，無可避免影響港商在海外的投資和業務決策，港商需調整經營模式和策略。

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超大市場規模，製造業也具有全產業鏈、全部門優勢，且對美貿易依賴度較小。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十大任務，其中，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內需，是十大任務的首位，反映強化內需是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香港不同企業加強向內地不同省市拓展內銷市

場，是減少關稅影響、減輕依賴美國市場的重要出路。

國家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化角色越來越重要。在國家支持下，香港深化國際交往合作，更是香港助力國家和自身應對貿易戰的必然要求。針對不公平貿易措施，特區政府應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申訴，敦促美方糾正錯誤政策，捍衛自身合法權益。此輪關稅措施可能促使部分美國盟友重新評估對美經貿關係，進一步尋求多邊合作機會，以及藉機改善與中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並深化合作，特區政府可爭取與其他經濟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為港商開拓新市場創造更好的條件。

美國反覆不定、激進的貿易政策會引起資產市場波動。大幅加徵關稅亦會令美國通脹加劇，恐怕會令利率維持高水平，增加企業融資成本，特區政府應適時為企業資金及市場拓展方面提供支援。未來，港商也可在三方面調整對策：

一、調整供應鏈強化及多元化布局，繼續推進「中國+N」策略，在未被告稅或稅率相對低的地區積極尋找替代生產基地。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未有被納入此次關稅調整的適用範圍，而一些南美洲國家的關稅調整幅度亦相對較低，例如巴西、秘魯、智利、阿根廷等僅被徵收10%的關稅稅率。

二、本輪關稅同樣對美國進口商與零售商造成重大衝擊，港商可與其建立合作聯盟，爭取政策調整空間。

三、企業透過加大研發、技術創新、品牌發展及綠色轉型方面的投入，以增強市場競爭力及產品的獨特性。

建設知識產權樞紐 助自主知識產權出海

林順潮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當今世界正加速邁向以知識和創意為核心驅動力的經濟時代，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已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關鍵

所在。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統計，過去15年間，全球對於品牌、外觀設計等無形資產的投資增速遠超工廠、機器等有形資產，截至2023年，全球企業持有的無形資產總值已達約61.9萬億美元。這一趨勢凸顯了知識產權在推動創新、塑造品牌和促進產業升級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筆者本年的其中一個人大議案是關於建設香港成為世界知識產權之都的建議。

協同合作形成區域力量

作為全球商業和金融中心，香港在知識產權、文化創意及科技創新領域具備獨特優勢，同時也面臨一定挑戰。優勢方面，香港擁有高度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和成熟的普通法法律框架，其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與國際接軌，專業服務行業高度發達，在版權、商標、專利等方面積累豐富經驗。同時，香港匯聚國際人才，兼具中西文化交融的創意氛圍。這些優勢為香港發展成為區域乃至全球知識產權樞紐奠定了堅實基礎。挑戰方面，香港本地產業規模較小，市場容量有限，創新成果的產業化能力仍需提升。此外，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科技創新的迅猛發展，香港需要進一步發揮自身國際化優勢，加強與內地協同合作，彌補知識產權創造與運用方面的短板。

建設「全球知識產權樞紐」與國家發展戰略高度契合。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若能充分利用這一機遇，依託國家倡導的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發展及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在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等全鏈條發力，香港不僅能更好地

服務國家需求，也能推動自身經濟邁向新高。

香港應加強與內地在版權、專利、商標等領域的立法協作，參與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營造更嚴格、更透明的營商環境。同時，香港可充分發揮其國際法律服務的專業優勢，向全球提供高水平的知識產權法律諮詢及仲裁服務。此舉將有助於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對標國際最高標準，吸引更多國際創新成果在港確權並處理爭議，提升區域內知識產權保護的公信力。

發揮優勢佔據全球市場高點

其次，香港應建設知識產權對外交流中心，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該中心可作為內地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專利申請、商標註冊及維權訴訟的一站式服務平台，幫助企業降低知識產權風險。通過這些舉措，香港能夠充分發揮其國際化橋樑作用，成為內地知識產權邁向全球市場的重要門戶。

此外，香港可探索建設知識產權數字交易平台，利用區塊鏈等技術推動知識產權確權、登記及交易的數字化進程。中央可支持香港將數字文化產業納入國家相關產業政策體系，並通過專項資金和政策扶持在港發展數字文創項目。借助數字科技賦能，香港可打造集IP創造、展示、交易於一體的線上生態系統，推動知識產權成果產業化，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提供新動力。

香港建設全球知識產權樞紐，不僅能夠推動自身經濟轉型升級，也將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發揮獨特作用。隨着香港吸引更多全球創新資源和知識產權交易，我國自主知識產權將在國際市場佔據更重要的地位，「中國創造」的品牌形象也將進一步鞏固，助力我國從知識產權引進大國向知識產權輸出大國轉型。

中印攜手東盟 和平共處共建共贏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中國積極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加快布局馬來西亞、越南和柬埔寨等東盟國家。作為亞洲另一大國，印度近年來通過「東向戰略」不斷加強與東盟各國的戰略聯繫，尤其在文化、技術與安全領域的存在感日益增強。對於中國而言，未來若要深耕東盟市場、提升區域影響力，必須將印度作為一個重要變數納入區域戰略思考，思考如何與印度在該地區「共處、共建、共贏」。

從歷史層面看，中印移民對東盟國家社會結構和經濟體系的塑造可謂根深蒂固。據估算，東盟地區現有超過3,000萬華人，是全球海外華人最集中區域之一。中國移民自明清時期開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入東盟，從事貿易、礦業、農業和手工業，逐漸建立起龐大的商業網絡和社團體系。

作為東盟國家的第二大移民群體——印度移民早已大規模進入東盟，大量南印度勞工在馬來亞、緬甸、新加坡等地工作。印度裔社群在宗教、語言、法律、醫療和香料貿易等方面形成獨特影響力，也在教育、科技等現代產業中嶄露頭角。這些歷史移民形成了中印在東盟的「民間外交基礎」，為未來在地區開展合作提供了社會基礎與文化紐帶。

聯通基礎設施

中國與印度目前在東盟的發展路徑各有側重，但二者的合作與競爭已顯現出某種交匯趨勢。作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在2024年與東盟的進出口總額高達9,823億美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的約16%。中國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能源、製造與數字經濟等領域，標誌性項目包括中老鐵路、雅萬高鐵和中泰鐵路等。同時，中國通過設立孔子學院、提供教育獎學金和推動人文合作，不斷強化軟實力。至於印度則通過「東向戰略」加速與東盟國家在安全對話、佛教文化和IT服務等領域的合作。

中印可以探索在東盟協同發展的可能性。首先，中印可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實現互補投資，例如進行「第三方市場合作」，兩國共同參與東盟國家的泛亞鐵路網、港口物流體系和跨境數字走廊等項

目。其次，公共產品的供給合作可為中印關係「破冰」，如在醫療援助、氣候應對、食品安全和水資源管理等領域展開聯合行動。第三，中印可以共同設立技術培訓中心、AI孵化器和遠程教育平台，助力本地青年就業與中小企業數位化轉型。最後，在多邊平台如RCEP、中國—東盟自貿協定（「10+1」）和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中推動政策協調，設立「中印—東盟三方合作機制」，通過數據評估、風險預警和政策建議提升合作效率。這些舉措不僅能夠緩解競爭壓力，也將助力中印與東盟實現更高水平合作共赢。

具體化解分歧

然而，挑戰也不容小覷。其一，中印在某些敏感地緣議題存在分歧，導致中印在區域戰略合作中互信基礎薄弱，雙方對彼此的意圖缺乏足夠的透明度。

其二，在具體經濟領域，如基礎設施、科技和市場准入等方面，中印企業往往存在競爭。例如，中國企業憑藉資金、技術和規模優勢在東盟國家推動高鐵、港口和能源等大型項目，印度則更加側重於中小型項目和資訊技術服務。這種錯位的市場策略導致雙方缺乏協同效應，甚至可能在部分項目上形成直接競爭。此外，雙方在東盟市場准入也面臨壁壘。中國企業在部分國家因市場主導地位受到限制，印度企業則因資金與技術實力不足，難以大規模進入關鍵領域。

其三，中印在東盟的合作還受限於東盟國家的「平衡外交」策略。東盟國家普遍推行「不選邊」的外交政策，力求在中美、中印等大國競爭中保持戰略模糊。這種模糊策略雖然有助於維護東盟的獨立性，但也使中印與東盟的合作變得複雜化。例如，在涉及區域基礎設施、海洋安全或數字經濟等領域，東盟國家可能有意拉長談判過程，避免過度偏向任何一方，增加三方合作的協調成本。

其四，在具體的商業實踐中，中印企業在法律體系、商業文化和運營方式等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中國企業通常通過大規模投資和快速行動推動項目落地，印度企業更傾向於靈活的市場化運作。此外，東盟國家的法律框架複雜多變，尤其是在土地使用、環保標準和勞工保護等方面的規

定，可能導致項目進展緩慢。加上語言、文化和管理風格的差異，進一步增加中印企業在東盟合作中的溝通成本與執行難度。

推動地方或協會間合作

儘管存在差異與挑戰，但中國在東盟合作不能忽略印度因素。未來，雙方可在互利共贏的框架下拓展合作，特別是在非敏感、技術導向和公共產品領域展開合作試點。

具體而言，可以推動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之間的合作；聯合運用華人和印裔社群的資源，設立「三方僑民合作平台」，促進東盟本地企業與中印資本的對接；推動中印高校、智庫與東盟學術界聯合開展政策研究、教育項目與人才流通機制。這些務實合作路徑不僅有助於化解分歧，也為三方互利合作提供更穩固的支撐。

香港作為國際經貿、金融中心，可在中印—東盟合作發揮不可替代的橋樑作用。首先，香港的印度裔社群歷史悠久，形成中印文化交匯的獨特窗口，為雙方開展人文交流和民間合作提供重要紐帶。其次，香港擁有成熟的金融服務體系和全球化的法律環境，可以為中印企業進入東盟市場提供融資、法務和風險管理支持，成為區域合作的核心樞紐。第三，香港可以依託金融創新優勢，推動設立「中印—東盟合作投資基金」，重點支持初創企業、綠色科技和可持續發展專案，助力東盟的經濟轉型與創新增長。第四，香港的高校與智庫，可牽頭中印和東盟各國的高校和智庫，建立「區域合作研究聯盟」，聚焦數字經濟、氣候變化和基礎設施發展等領域，為中印—東盟合作提供數據分析、政策建議和人才培育支持。

香港可成「區域樞紐」

全球不確定性上升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與印度如果能在東盟找到合作路徑，主動設計中印—東盟三方合作機制，推動合作共建共贏，不僅能夠維護本國利益，也為亞洲和平繁榮注入更多穩定性與建設力量。香港可作為中印—東盟的「區域樞紐」，在促進多邊經貿對話、推動跨境資本流動及區域技術合作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進一步提升三方合作的效率與深度。

加快處理「假難民」問題 保障香港利益

盧偉國 立法會議員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立法會近日通過了一項議員議案，促請特區政府進一步優化處理免遣返聲請及遣返程序，研究修改法例，以

加快處理積壓個案，更好保障香港社會整體利益。

根據入境處資料，截至2024年11月底，仍有共15,782名免遣返聲請人在港。免遣返聲請者問題持續困擾本港社會，一方面，處理免遣返聲請需耗用大量公帑，綜合相關統計，在2014年至2024年間，用於遣送聲請被拒人士、審核聲請、處理有關上訴或呈請以及提供各項人道援助服務的相關開支持續攀升，總開支逼近100億元，足以用來興建約1萬個公屋單位。在當前本港財政緊絀的情況下，如何善用資源，減少浪費公帑，顯得更為迫切。同時，濫用免遣返聲請的「假難民」滯留問題也為本港帶來各種治安方面的挑戰，一些「假難民」淪為非法「黑工」，甚至被非法集團招攬從事犯罪活動。

多年來，經民聯一直促請特區政府加大力度打擊「假難民」非法入境及留港的問題。現屆特區政府亦十分重視，採取了不少新舉措，包括在2022年12月實施新的審核及遣送政策，以減少聲請不獲確立者透過提出相關訴訟拖延其非法在港時間；入境處於2024年9月3日又推行預先通報，乘客資料系統，阻截包括潛在的「假難民」等不受歡迎人士乘坐航班來港。特區政府應適時檢討這些新措施的成效。

不過，為了徹底解決「假難民」滯留問題對本港造成的各種嚴重影響，特區政府仍需迎难而上，匯聚各方面的力量，多管齊下推出政策配套，務求治標兼治本。

首先，特區政府應優化現有資源的運用，加速處理「假難民」申請和審核程序。一方面應給予免遣返聲請者的法律援助訂立明確的時限，並與司法機構商討，加快處理免遣返聲請個案，以及盡快堵塞相關人士濫用司法覆核機制的漏洞；另一方面應調撥資源，並善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加快審核「假難民」的申請，務求「假難民」盡快離境。

其次，特區政府應完善法例，並加強執法。很多市民都建議，應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修訂現行法例，凡未經有效簽證抵達本港的非法入境者，均必須關押在禁閉式設施。換言之，所有免遣返聲請者在完成甄別程序前，不會再獲發臨時身份證明書（俗稱「行街紙」）。此舉雖然要動用不少社會資源，但是最有效減低他們來港打黑工賺錢的誘因，以及被非法集團招攬犯案的機會。

歸根究底，從源頭堵截「假難民」是最重要的。特區政府既要加強與內地執法機關的合作，嚴厲打擊非法偷渡活動及販運人蛇集團，全方位堵截非法入境活動，同時請中央政府協助，要求「假難民」來源較集中的相關國家和地區嚴厲打擊當地的偷運人蛇集團，從源頭減少來港的「假難民」。